

关于马克思 恩格斯 历史唯物主义部分书信的解说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

GUANYU MAKESI
ENGESILISHIWEI
WUZHU YIBUFEN
SHUXINDE JIESHUO

河北人民出版社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 历史唯物主义部分书信的解说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石家庄

封面设计：陶书润

2637/03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
历史唯物主义部分书信的解说**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2,800
统一书号 2086·84 定价 0.35 元

前 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部分书信，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文献。在这些书信中，马克思、恩格斯完整准确地阐明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人民群众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我们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必读的教科书。

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拚命鼓吹“上层建筑决定论”、“全面专政论”、“英雄创造历史”等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谬论，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搞得混乱不堪，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是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内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依据。认真学习这些书信，对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八封书信（部分是节选）作了简要的解说。为了学习方便，我们把所选的八封书信的原文分别印在每一篇解说的前面。由于我们水平所限，解说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七九年二月

目 录

前 言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节选）	（ 1 ）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解说	（ 7 ）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	（ 32 ）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解说	（ 33 ）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节选）	（ 41 ）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解说	（ 43 ）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 51 ）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解说	（ 55 ）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	（ 71 ）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解说	（ 75 ）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节选）	（ 87 ）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解说	（ 94 ）
恩格斯致弗·梅林（节选）	（ 119 ）
《恩格斯致弗·梅林》解说	（ 123 ）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节选）	（ 140 ）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解说	（ 144 ）
后 记	（ 164 ）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节选)

[1846年]12月28日于布鲁塞尔

.....

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要谈上帝，谈普遍理性，谈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认为它永远不会错误，认为它永远等于它自己，认为只要正确地意识到它就可以获得真理呢？为什么他要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呢？

他自己给了我们一把解答这个哑谜的钥匙。蒲鲁东先生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发现了实现于历史中的进步。最后，他发现，人们作为个人来说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误解了自身的运动，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即不合常理的空话，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但是，蒲鲁东先生既然承认自己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他在使用普遍理性、上帝等等响亮的字眼时就承认了这一点，——岂不是含蓄地和必然地承认他不能理解经济发展吗？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大的事业呢。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

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象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其规则的保护下逐渐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所以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它们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的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

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而了解这么点东西竟是一个大功劳！可是，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适应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

范畴，即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这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而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却刚刚相反，抽象、范畴是原始的原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抽象、范畴就本身来说，即把它们同人们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自然是不朽的、不变的、固定的。它不过是纯粹理性的产物，这干脆就是说，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抽象的。多么美妙的同义反复！

这样，当做范畴形式来看的经济关系，对于蒲鲁东先生说来，是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的公式。

换句话说：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由于他谈到资产阶级的观念时，认为它们是永恒真理，所以他就寻找这些观念的综合，寻求它们的平衡，而没有看到，现在它们达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其实，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资产者所做的事情。他们都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即如果把它们看做抽象的概念，是生活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它们在实践中还得大加改善。他们全都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他们全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生活的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他们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

方式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也正象封建形式的情况一样。其所以发生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这种人不再是资产者。

所以，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一个空论家。对现代世界进行变革的历史运动，对他来说不过是要发现两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的平衡、综合的问题。于是这个机灵的家伙就借用诡计来发现神的隐秘思想，发现两个孤独思想的统一，而这两个思想所以是孤独的，仅仅是因为蒲鲁东先生把它们和实际生活隔离起来，把它们和现代生产、和作为这两个思想所表现的种种现实事物的结合物的现代生产隔离起来。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总之，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您现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了。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必须改变范畴，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

蒲鲁东先生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

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完全象一个政治上的空论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做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做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而这些力量的平衡正是表现于其中各个力量时胜时败的现代运动。例如，在十八世纪，许多平庸的人物都曾努力发现一个真正的公式，以便把各个社会等级、贵族、国王、议会等等平衡起来，而第二天早晨就无论国王、议会、或贵族都没有了。这一对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这些封建体制和这些封建体制的对抗的基础。

由于蒲鲁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纯粹理性范畴放在一边，而把人和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畴的运用的实践生活放在另一边，所以他自始就保持着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以许多形式重复表现出来的二元论。您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对抗不过是表明蒲鲁东先生不能了解他所神化了的各种范畴的世俗的起源和历史罢了。

.....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320—330 页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

解 说

这是马克思于1846年12月28日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一封信的节选。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固有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化起来，工人阶级的境况日益恶化，小生产者不断破产，其中尤以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法国为甚。小生产者们深感资本主义的发展给自己带来的只是频于破产的灾难，因而非常希望免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幻想有一个小生产者永世长存的太平盛世，以便保持或恢复他们的小私有者的经济地位。蒲鲁东主义便是代表频于破产的小生产者的要求应运而生的。

蒲鲁东（1809—1865）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蒲鲁东主义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产生于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典型代表。它的理论的核心是幻想在保存资本主义基础的前提下，寻找消灭贫困的方法。1846年，蒲鲁东发表了一部著作，叫做《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恩格斯指出：“在这部应使他名垂千古的著作中，蒲鲁东运用经过粗暴歪

曲了的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来论证一种奇怪的、完全不正确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企图用形形色色的先验的魔法来论证一种自由工人联合的新社会主义体系。”^①马克思在读了蒲鲁东的这部著作以后，就决定要批判这种严重阻碍共产主义思想在工人中传播的蒲鲁东的观点，同时，还决定通过这种清算来阐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许多理论和策略问题。恰巧俄国自由派著作家安年柯夫（1812—1887）于1846年11月1日写信给马克思，谈了自己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看法，并征求马克思的意见。马克思就给安年柯夫写了这封回信。1847年，马克思又发表了《哲学的贫困》一书，进一步阐明和发展了这封信中的思想和观点，对蒲鲁东主义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在这封信中，马克思痛斥了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所宣扬的唯心史观和改良主义思想，着重阐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整个社会关系的原理。

这封信（节选）共有十四个自然段，第一段到第三段，主要是揭露和批判蒲鲁东的唯心史观；第四段到第六段，主要是阐明社会历史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过程；第七段到第十四段，主要是批判蒲鲁东把范畴看作是“永恒真理”的谬论，并揭露其阶级根源和认识根源。

下面，我们就逐段加以解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69页。

第一段

在这一段中，马克思提了两个问题，对蒲鲁东的唯心史观进行揭露和批判。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要谈上帝，谈普遍理性，谈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认为它永远不会错误，认为它永远等于它自身，认为只要正确地意识到它就可以获得真理呢？”这里所说的“普遍理性”和“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按照蒲鲁东赋与它的含义，它既不是脱离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绝对的、纯粹的理性，也不是生活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活生生的、具体人的普通理性，而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没有人身体的“集体理性”或“人类理性”。他认为，这种“普遍理性”，概括了人类社会的“智能”，包含着人类社会的一切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既有消除坏的方面的“消毒剂”，也提出了以后的任务。在蒲鲁东看来，这种“普遍理性”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也就是说，社会历史的发展，仅仅是这种“普遍理性”的自我表现。蒲鲁东把这种“普遍理性”同“上帝”扯在一起。认为它虽不创造真理，但能发现真理。因为真理潜藏在“上帝”的心中。“普遍理性”的任务就是到“上帝”那儿把真理发现出来。谁去运用“普遍理性”到“上帝”那儿去发现真理呢？蒲鲁东吹嘘说，一直到他以前，“普遍理性”所发现的真理是不完备的、不充足的，因而也是矛盾的。只有他自己才担负起了发现完备而充足的真理的重担，才通过“普遍理性”到“上帝”那里发现了真理，找到了解决社会问题的综合公式。由此可见，蒲鲁东之所以要谈“上帝”，谈“普遍

理性”，谈“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就是为了给他的“哲学——经济学体系”提供一个工具。他自己曾坦白地说过：“在开始讨论构成这部新论著（指《贫困的哲学》——本书编者注）对象的各项问题之前，我得先说明一个看来无疑是个奇怪的假设：上帝存在的假设，要是没有这个假设，我的讨论将无法进行，也无法为人所了解。”又说：“当我摆脱了一切人事上的思考，在我心里默默地探索着社会种种变革的秘密的时候，上帝，伟大的不可知者，怎么变成我的一种假设，我的意思是说，变成了一种不可缺少的辩证工具。”^①说穿了，就是为了把他自己打扮成“上帝”的化身，“普遍理性”的化身，“真理”的化身，他永远不会犯错误，人类只要“正确地意识到”他建立的哲学——经济学体系，就可以“获得真理”了。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他要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呢？”所谓“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指的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黑格尔（1770—1831），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是欧洲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创立者，也是第一个系统地阐发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哲学家。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以前，就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宇宙精神”，或叫“绝对精神”。这个“绝对精神”是整个宇宙的基础，世界上任何现象，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和人的思维的现象，都是“绝对精神”的表现，都是“绝对精神”派生出来

^① 《贫困的哲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页。

的。由此可见，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过是“上帝”的代名词而已。黑格尔还认为，这个“绝对精神”，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开始，它以自己的纯粹形式发展着，叫“逻辑阶段”；以后，它把自己“外化”为自然，在自然界中发展，叫“自然阶段”；再后，它又把自己“外化”为社会，在人类社会中发展，叫“精神阶段”。每个阶段又都经历了三个小阶段。在“精神阶段”中，经过“主观精神”、“客观精神”，最后达到“绝对精神”，便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顶点。因此，他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是非常荒谬的。

但是，黑格尔哲学也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绘成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第一次系统地表述了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当然，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因为他认为运动、发展、变化的主体不是客观的物质世界，而是“绝对精神”，不是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是概念的推演和推论过程。由于在黑格尔哲学中，唯心主义体系占主导地位，因此，黑格尔主义是“软弱的”。他虽然有非常革命的辩证法思想，但这些思想是头足倒立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做出了非常保守的政治结论。他害怕、憎恨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极力维护、歌颂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制度，说普鲁士国家是历史发展的顶峰，应该永世长存。黑格尔的社会政治观点，受到了普鲁士王朝的极大赞许，他的哲学被列为当时高等学校的法定教科书，他本人被封为普鲁士王国的官方哲学家。

蒲鲁东是个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和经济学家。他不

懂得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活动的关系，不能正确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更不可能提出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可是，他又幻想从经济学上阐明他所要解决的问题，并妄图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这样，他就竭力仿效黑格尔，并借助于被他庸俗化了的黑格尔哲学体系，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例如，黑格尔把“绝对精神”当作世界的本原，蒲鲁东则把“普遍理性”当作人类社会的本原；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的发展分成若干阶段，蒲鲁东也把“普遍理性”在经济上的进化分为“分工”、“机器”、“竞争”、“垄断”等十个阶段；黑格尔利用“三段式”拼凑自己的哲学体系，蒲鲁东也把“三段式”奉为至宝，构成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等等。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深刻地揭露了蒲鲁东的唯心史观。尽管蒲鲁东曾经吹嘘，他要创造一种新的哲学——经济学体系，但是，正如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所说的：“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这套怪论不是别的，正是“黑格尔式的废物”。

第二段

在这一段中，马克思揭露了蒲鲁东把社会发展当作“普遍理性”的自我表现的谬论。在这段一开头，马克思就指出：“他自己给了我们一把解答这个哑谜的钥匙。”“这个哑谜”，指的就是上边提出的两个“为什么”。蒲鲁东虽然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发现了实现于历史中的进步，并且同时还看到了这种进步似乎是与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